

土耳其政局与未来中东地区格局

◎孙德刚



■2016年7月土耳其未遂政变时的街头景象。

资料图片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支点国家。它不仅是北约在中东唯一的成员国,而且是欧盟的候选国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对话伙伴国。在全球经济领域,土耳其和沙特一道跻身二十国集团,一度成为中东国家的“佼佼者”。土耳其政府雄心勃勃,宣布到2023年即土耳其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国内生产总值将跻身全球十强。

然而,近年来土耳其经济增速下滑,与俄罗斯、希腊、以色列、亚美尼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周边国家关系紧张,国内民族分裂势力抬头,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频发,加上300万叙利亚难民的涌入,社会矛盾激化。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造成1000多人死亡,埃尔多安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抓捕了数千名涉嫌参与政变的军官、警察以及持不同政见的律师、记者和知识分子等。土耳其政局的动荡对中东格局、地区国际关系和中东国家国内政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东地区格局从单极走向多极

冷战后,中东地区曾形成了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奥巴马上台初始,土耳其、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被视为支撑美国中东霸权的“三大支柱”。2010年底中东地区爆发“阿拉伯革命”以来,美国、欧盟、俄罗斯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等域外力量在中东形成了“群龙之势”。美国、欧盟、土耳其和沙特等组成了“支持政局改变阵营”;俄罗斯和伊朗等则形成了“反政变更迭阵营”;中国、印度等亚洲大国成为第三种力量,在“不干涉内政”与“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下维护地缘经济利益,各方在联合国等多边舞台围绕叙利亚内战、也门危机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等斗智斗勇。土耳其支持北约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并参与到叙利亚的动荡局面之中。

在2015年伊朗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与伊朗

达成核协议、美伊关系缓和后,美国的盟友沙特和以色列对奥巴马政府深表不满;2016年7月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政府指责流亡美国的居伦是幕后推手,甚至指责美国情报部门暗地支持居伦运动、图谋颠覆埃尔多安民选政府。美国则长期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引渡居伦,美土之间因此出现龃龉。整体来看,美国在中东的联盟体系面临危机,北约军事联盟也受到冲击。经过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元气大伤,国内孤立主义情绪上升,中东在美国全球的战略地位下降,美国政府主导中东事务、推动民主化的热情减退,中东单极格局让位于多极格局。

英国脱欧后,欧盟更加关注自身问题,对中东事务的参与能力和意愿也大大下降。欧盟近年来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经济下滑、右翼势力上升等内部问题突出,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小。尤其是未遂政变发生后,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埃尔多安政府所谓“打击

异己”、“侵犯人权”、“践踏民主”、“法治倒退”等指责不绝于耳,土耳其也拉开了与欧盟的关系。

俄罗斯利用土耳其未遂政变扩大在中东的政治影响力。由于欧盟对俄经济制裁延长至2016年底,加上美俄关系恶化,俄急需利用中东热点问题转移国际社会对乌克兰问题的注意力。有消息称土耳其政变发生前数小时,俄罗斯即向埃尔多安政府提供重要情报,为土耳其迅速粉碎政变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受到土耳其的高度赞赏。未来,俄将进一步离间土耳其与北约和欧盟关系,甚至不排除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欢迎土耳其成为观察员国或正式加入上合组织,土耳其向俄、中、印等新兴国家靠拢,将进一步推动中东多极化。

中东地区均势从静态转向动态

中东缺乏全覆盖的地区组织,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地缘政治争夺和安全

零和博弈成为中东地区的“新常态”。受此影响,土耳其、伊朗、沙特、埃及、以色列等地区强国形成了一组战略平衡,而土耳其政局变化恐将打破原有的地区均势。

6年来,“阿拉伯革命”从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一直蔓延到也门、巴林和叙利亚等国,利比亚、也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国形成了“中东动荡区”,同时,土耳其、以色列、伊朗、沙特、阿联酋、卡塔尔、阿曼和科威特等国曾形成了“中东稳定弧”。后者一度发挥了“稳定器”功效,在难民救治、中东冲突管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不仅如此,中东地区稳定国家还相继出台了国家振兴计划,如土耳其提出的“2023计划”,沙特提出的“2030愿景计划”,伊朗提出的“第6个五年发展规划”等,均希望成为中东地区发展的“领头羊”,填补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后的权力真空。

然而,沙特介入也门冲突并与伊朗

断交,土耳其恐怖袭击事件频发甚至爆发未遂政变,导致“中东稳定弧”中的支点国家有丧失战略发展机遇期的风险,沙特和土耳其国内发展前景尚不明朗。

此外,中东地区还有许多不可预知的风险。“伊斯兰国”组织实施外线斗争策略,库尔德人自主意识上升,沙特和伊朗等中东伊斯兰大国矛盾公开化,巴林、苏丹、索马里和吉布提等国同伊朗断交,迫使埃及、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等国纷纷调整各自的战略,中东地区大国的均势正在酝酿新变化。为改善外部环境,埃尔多安政府一方面试图与以色列、叙利亚和伊拉克等邻国缓和关系,另一方面继续推动与沙特和埃及的战略合作;伊朗则利用核协议达成之后的契机,在也门、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等战略利益区提前布局,主动向土耳其示好,以孤立沙特;沙特则联合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制衡伊朗,中东地区力量将重新分化组合。

中东地区权力结构走向多元

“阿拉伯革命”爆发以来,从利比亚到埃及,从也门到叙利亚,从伊拉克到土耳其,原有的威权统治受到削弱,“一元化”权力结构被打破,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极端主义甚至是恐怖主义力量等“多元”权力结构正在形成。

宗教力量与世俗力量成为中东国家内部权力结构的第一组矛盾,影响中东各国的政治生态。在土耳其,以正义与发展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力量和以军队为代表的世俗力量曾相互制衡、相互影响,成为土耳其模式的重要特征。然而,未遂政变的爆发表明,中东伊斯兰力量和世俗力量都不再是铁板一块,埃尔多安领导下的正义与发展党与居伦运动原本同属温和伊斯兰力量,现已分道扬镳,居伦运动甚至被土耳其政府贴上了“恐怖主义”和“美国代理人”的标签。除温和伊斯兰力量外,激进主义、极端主义乃至打着宗教旗号的恐怖主义力量纷纷登场,使当前中东国家内

部权力结构分散化。同样,中东地区世俗主义力量也进一步分化,如被誉为“世俗主义大本营”的土耳其军队已呈现意识形态多样化,有的力挺正义与发展党,有的坚守世俗主义,有的支持民族主义,有的暗地追随居伦运动,不一而足。

军队与政治关系成为未来中东国家内部权力结构的第二组矛盾。无论是土耳其、埃及还是其他伊斯兰国家,军队始终是影响国内政治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1960年、1971年、1980年、1997年和2016年,土耳其相继发生了五次军事政变,土耳其军队曾经是重要历史关头维护政局稳定的“压舱石”。这次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后,1500多名军人因涉嫌参与政变遭政府逮捕,尤其是军队中的部分高级将领已被“大换血”。除土耳其外,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伊拉克等中东转型国家局势的走向,也与军队及形形色色的地方武装存在重要关系。

近年来,中东许多国家中央政府的权威在弱化,地方政府的权威在强化;国家建设能力在弱化,族群凝聚力在强化;国家认同在弱化,教派认同在强化。中东国家中央政府治理能力的下降和地方武装派别的暗流涌动互为因果,有些地方武装在外部分势力的操纵下沦为“代理人”,成为中东民族国家重建的重要挑战。中央和地方关系渐渐成为未来中东国家内部权力结构的第三组矛盾。

总之,土耳其政局动荡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域外大国中东战略的调整、中东地区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和中东国家内部权力“破碎化”等相关叠加的产物。作为中东地区的支点国家,土耳其政局的变化将牵动中东地区战略格局的神经,对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中东地区大国的权力平衡以及中东国家内部宗教与世俗、军队与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英国“脱欧”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影响

◎王敏洁 许林海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6月的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乎人们的意料。历经月余,其短期冲击效应正在逐步消散。从中长期来看,这一逆全球化的事件很可能成为标志性的历史事件,给世界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

英国退出欧盟对自身的影响

“脱欧”公投之后,对英国经济最大的冲击是英镑贬值。一个月以来,英镑兑换美元下跌约13%,创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低;不过目前英镑急剧下跌的态势已经得到遏制。英国公投结果宣布当日,全球股市市值蒸发超过2万亿美元;到7月初,全球股市的创伤已渐渐平复,英国股市也收复失地。金融信息公司Markit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7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跌至47.7,是2009年4月以来最低点。数据显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出和订单都有所下降,不过出口有所提升,这得益于英镑的贬值。

尽管“脱欧”公投一个月来,英国经济并没有发生危机,但市场对其长期经济走势仍有担忧。出于对英国“脱欧”后的不确定性考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将英国2016年经济增速预期下调0.2%—1.7%,将2017年英国经济增速预期下调0.9%—1.3%。

退出欧盟在短期内对英国是有利的。首先,可以立即省下向欧盟缴纳的高额“会费”。近年来,英国稳定保持了欧盟第四大会费缴纳成员的地位,欧盟预算的四分之一由英国承担;如果英国退出欧盟,省下的这笔钱可以极大地改善英国政府的财政预算和英国公民的福利。其次,“脱欧”还意味着英国能够摆脱欧盟高度计划的财政政策、(农、渔)业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回归自由竞争和实用主义传统,摆脱欧盟将使英国许多中小企业不受欧盟规章制度的钳制,就业机会可能会因此增多。另外,“脱欧”可以缓解移民和难民危机对英国社会的压力。根据欧盟规定,所有欧盟国

家公民有权在成员国的任何地方生活和工作,英国政府并不享有制定移民政策的自主权,所以,近年来,随着北非、中东国家政治动荡,英国与其他欧盟国家一样承受了蜂拥而至的难民潮带来的压力;退出欧盟之后,英国可以制定自己的移民政策,从而缓解由此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压力。

中长期来看,退出欧盟会严重打击英国经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退出欧盟将严重打击英国的金融业,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面临威胁。伦敦是仅次于纽约的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据官方调查,欧盟各国资本市场活动有近80%发生在英国,超过75%的欧洲对冲基金资产和大量的欧盟OTC衍生交易、风险投资活动集中在英国。退出欧盟之后,制度环境的变动会促使金融机构逐步把部分业务转移出英国,英国金融和房地产市场都可能出现趋势性下跌,这两个支柱产业的下行将对英国经济产生持久和深刻的冲击。

其次,退出欧盟将对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带来不利影响。欧盟是英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英国对欧盟其他国家的出口大约占到英国总出口的47%,从欧盟其他国家的进口大约占到英国总进口的52%。退出欧盟后,英国的进出口贸易面临新的壁垒风险。根据经合组织(OECD)4月发布《英国“脱欧”的经济后果》报告的测算,退出欧盟之后,如果英国与欧盟之间重新确立世贸组织最惠国(MFN)规则,则英国对欧盟出口减少5.8%,从欧盟进口减少9.4%;如果英国与欧盟之间确立的是自由贸易协定(FTA)规则,对欧盟出口减少3.1%,从欧盟进口减少6.3%。随着时间的推移,“脱欧”为英国出口贸易带来

的负面影响会越来越大。

再次,退出欧盟之后的英国投资吸引力将不断下降,外国直接投资(FDI)也将不断降低。根据经合组织的统计,在2014年进入欧盟15个较大的经济体(不含英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中,英国占到34%多一点,高居各国的榜首,而且2014年英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中的约48%来自欧盟国家,之所以英国具有这样的投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能够进入欧盟市场。英国退出欧盟之后,不再能够进入欧盟单一市场,外国直接投资的减少将是不可避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必会带来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的走低,同时会打击创新能力和技术进步的提升。

欧盟受到的影响

英国退出欧盟,遭受损失最大的就是欧盟。欧盟曾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最成功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德、法等国通过欧盟提高了出口,希腊等国则通过欧盟提高了信用资质。但是欧盟面临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包括“统一的货币政策、分割的财政政策”、各国经济严重分化、利益诉求难以协调和银行坏账高企等等,在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希腊债务违约、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威胁等挑战面前,欧盟成员国无法协调立场和统一行动。英国选择脱离欧盟,意味着二战后欧洲主要国家建立的政治经济合作机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欧洲一体化进程有可能遭到逆转。

英国是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其国内生产总值占整个欧盟的17.56%,仅次于德国;从进出口贸易来看,英国对欧盟进口的贡献为14.5%,对出口的贡献为11.6%,也仅次于德国。因此,英国的

离去使欧盟经济总量损失不少;由于互为贸易伙伴和紧密的经济联系,德国及其他欧盟国家的经济也会受到英国“脱欧”的打击。

英国“脱欧”后欧盟出现的预算缺口可能引发一系列后果。首先,欧盟扩张的速度将大大减缓,这是由于随着英国的离去,欧盟给新的成员国经济“输血”的能力受到了限制,短期内已无力继续扩张。其次,英国“脱欧”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欧盟对成员国再次提供大规模救助的能力,欧债危机可能重新发酵。再次,其他会费净缴纳国将被迫分担英国的出资额度,这有可能会进一步激发前者国内的不满和新的政治动荡。

英国在欧盟内部被视为“经济自由主义阵营”的代表,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德、法的高度集权、意识形态歧视及部分成员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英国“脱欧”后,德国和法国在欧盟的主导性影响力将进一步强化,欧盟的经济贸易政策或由平衡趋向保守,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欧盟很可能滑向贸易保护主义。

快速扩张的欧盟把竞争力、经济结构与经济周期存在很大差异的国家强力整合,实施了统一的货币和货币政策,导致欧元区经济结构性失衡,因此导致欧元汇率波动和财政统一进行结构调整。但是随着英国退出欧盟,欧盟调整经济失衡的进程将会大大延缓。

英国退出欧盟对美国和日本的冲击

在英国“脱欧”公投的影响下,市场避险情绪高涨,世界主要货币均呈现大幅波动。短期内,英国“脱欧”将

对主要国际货币继续造成冲击,英镑和欧元出现阶段性贬值是大概率事件,而美元、瑞士法郎、日元很可能将成为重要避险货币,被迫快速升值;虽然人民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国际避险货币,但美元升值将推动人民币相对贬值。

因此,美联储加息进程和各国货币政策、汇率政策都受到一定冲击。美联储主席耶伦近期在出席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英国“脱欧”将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美国经济、劳动力市场和通货膨胀等造成冲击和影响,美联储需确定英国公投结果不会带来震荡,才会考虑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对于欧元区、中国、日本等全球主要经济体而言,其货币政策也都受到一定冲击,被迫做出相应调整。此外,由于英国“脱欧”还将导致各国汇率政策出现错位,预计2016年9月在中国杭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各国会将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作为重点内容。

英国退出欧盟会削弱欧盟和英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中的博弈力量,将导致美国在全球贸易和经济及政治方面的话语权进一步加大,美元的强势短期内也难以改变,这可能将对全球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英国“脱欧”使日元表现强势,不过对日本经济未必利好。日元是低息货币,日本金融市场成熟稳定,并没有直接卷入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因而日元成为当之无愧的一种避险货币。由于日本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经济前景不容乐观。日本企业也一直将英国视为企业联系欧洲市场的“桥梁”,进入英国的日本企业数量已超1300家,几乎包括所有日本国内

重量级大型企业在内,因此,英国“脱欧”之后,日本经济的未来也蒙上一层阴影。

英国退出欧盟对中国的影响

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国际地位,英国退出欧盟,中英、中欧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往来只能进一步深化,并不会出现明显下降。不过,英国“脱欧”对中国仍有一些不利影响。

首先,中国希望通过英国进入欧洲市场的战略意图需要转变。2015年以来,中英之间逐步强化贸易往来,英国逐渐转变为中国的重要支持者和伙伴;然而由于英国“脱欧”,中国通过英国加强与欧盟合作的战略意图失去了根基,打入欧盟市场的重要贸易、投资和金融服务通道将受到一定阻碍。

其次,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有可能会被拖累。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为中国在欧洲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熟悉国际金融市场规则提供了重要场所,成为仅次于中国香港的第二大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英国“脱欧”后,人民币通过英国在欧洲推广的战略成本大大增加,英国不再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佳战略伙伴。

不过,英国“脱欧”也可能给中国带来很多新的战略机遇:首先,英国“脱欧”会加强英国对中国的需求,英国更加迫切地需要与中国开展全方位的合作,促进中英合作进一步深化,中国的国际金融地位也将得到提升。其次,英国“脱欧”导致欧元的国际地位下降已是必然,从而人民币相对价值上升,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良好机会。再次,英国“脱欧”之后,英国及欧盟的不确定性风险上升,中国经济如果能够持续稳定,中国资产或许将成为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